

当代名人自述

·



·



半生风雨录

——贾亦斌自述

贾毅 贾维记录整理

当代名人自述

半生风雨录

——贾亦斌自述

贾毅 贾维记录整理

中国文史出版社

(京)新登字第 107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半生风雨录/贾亦斌著. —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6. 10
(名人自述丛书)

ISBN 7-5034-0773-5

I. 半… II. 贾… III. 贾亦斌—回忆录 IV. K827.7 中国版
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第 10859 号

出版发行: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 址:100811 北京太平桥大街 23 号

印 刷:北京通县燕山印刷厂

装 订:富利装订厂

经 销: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 本:850×1168

印 张:9.375 字数:200 千字

印 数:1—5000 册 插页:3

版 次:1996 年 10 月北京第一版

印 次:199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16.00 元

文史版图书如有印、装错误,本社发行部负责退换。

一九四二年第三次
长沙会战后留影，时任
七十七师少将参谋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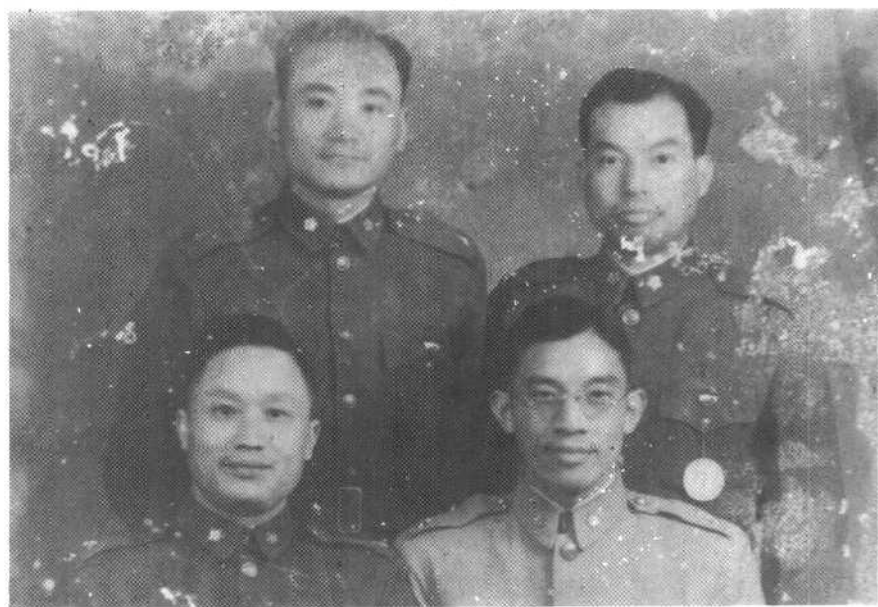
一九四六年九月，庐山青年军
复员检讨会后与蒋介石合影



一九四六年九月，作者
夫妇在南京上新河留影



一九四六年冬，陪同蒋经国视察北平青年军，在“卢沟晓月”碑前合影，左三为作者。



一九四七年与预干局主要负责人合影，前排右为作者，左为徐思贤，后排右为郑果，左为黎天铎

一九四九年四月嘉兴
起义前在上海留影



一九四九年三月作者被撤职后与嘉兴预干团同仁
合影(中排右五为作者)



一九九六年三月四日在全国政协八届四次会议民革小组会上与江泽民总书记、王兆国同志的合影



一九九〇年与李先念主席、胡秋原夫妇、程思远等人的合影
(第一排右一为作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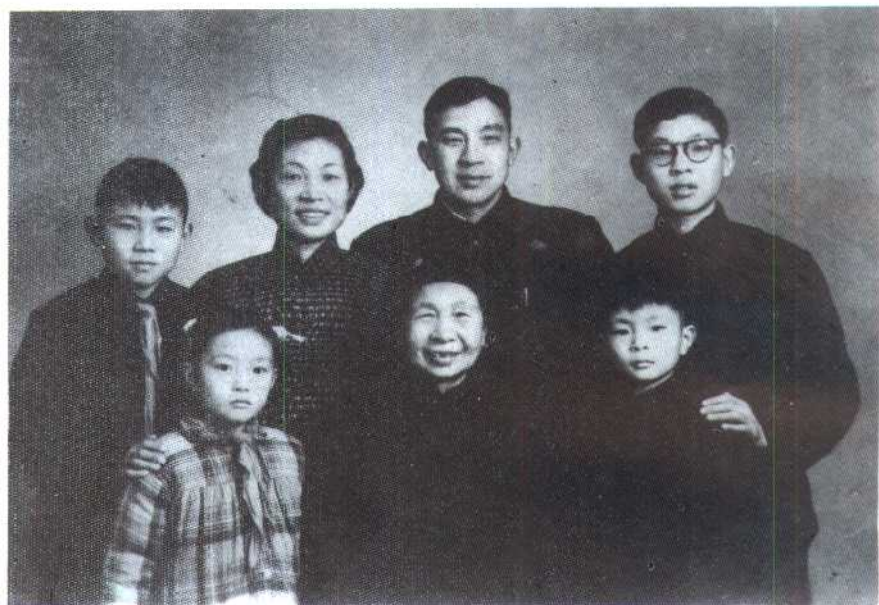
一九八九年在溪口蒋经国先生之母毛氏殉难处留影



一九八九年纪念嘉兴起义四十周年，与李恺寅同在嘉兴南湖烟雨楼



一九八九年纪念嘉兴起义四十周年，作者与部分起义骨干在当年预干团驻地旧址合影



一九六二年作者全家合影,中间老人为作者母亲



一九八八年作者全家合影

序

从士兵到将军，从行伍出身到陆军大学教官，从蒋经国的挚友到国民党政府的叛逆，从旧中国高级军官到新中国政协常委，具有这一特殊经历的贾亦斌同志是我的老同事、老朋友。我同贾公同在政协，共事有年。我们相识在50年代。他是政协全国委员会二届三次会议增补的委员，四届人大代表，五、六、七、八届全国政协常委，民革中央副主席和名誉副主席。如今他已84岁高龄，仍孜孜以求，读书、著述，不倦地工作。

贾公1912年出生，湖北省阳新县人，一个出身寒苦的农家子弟。他少年失学，十几岁便当了兵。在抗日烽火中，他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誓死不当亡国奴的信念，参加过淞沪、徐州、武汉、鄂西、长沙诸大战役，英勇顽强，打击日寇，两次负伤不下火线，屡立战功。曾任国民党军队连、营、团长和师参谋长，后晋升为国防部少将代局长。1943年，考入国民党陆军大学特别班第七期学习，毕业后兼任教官。他勤奋读书，发表论文《新国防论》和专著《预备干部制度的理论与实际》。他的这一构思，

日后成为台湾至今仍在实施的预备干部制度的蓝本。

贾亦斌与已故蒋经国先生素昧平生,但在1946年到1949年期间,从他介入青年军复员工作开始,到主持预备干部组训工作,直至由蒋的副手到接替蒋的职务,与蒋经国成为亲密的好友。贾公具有典型的劳动人民耿介的性格与强烈的爱国意识。他坚决反对并拒绝参加蒋介石发动的内战。他体谅士兵疾苦,爱护热血青年,安置复员青年军人就学深造,成绩斐然。他惩办杭州青中校长贪污案,雷厉风行。他身为国民党高级将领,却俭朴自律,纤尘不染。蒋经国曾这样评介他:“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怕死,则天下太平矣。贾亦斌兼而有之。”因而深受蒋氏器重,且私谊亦深。贾亦斌与谭吟瑞(谭嗣同孙女)喜结连理时,蒋主动担当证婚人并主持婚礼。

贾亦斌一贯反对内战,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反对四大家族的腐败统治,他曾寄望蒋经国能领导青年军有所作为。1948年,蒋到上海搞所谓的经济管制“打老虎”,开始时似决心很大,不久即偃旗息鼓,令贾大感失望。他与蒋激烈争辩,对蒋经国的忠孝观不能苟同,遂痛下决心与之分道扬镳。1949年4月7日,为了策应中国人民解放军渡长江,贾亦斌在中共中央上海局领导下,毅然率部起义。由于贾亦斌是蒋介石父子亲自提拔、破格重用的将领,起义军又是抗日后期,为同日寇作最后决战,以“十万青年十万军,一寸山河一寸血”相号召,而建立起来的“知识青年远征军”,又称“太子军”,因此他

的率部起义就有“从蒋家心窝里反出来”的特殊意义而引起国内外瞩目和蒋介石政府的震惊，乃以几十倍的兵力“围剿”起义军，并重赏缉拿贾亦斌。

《半生风雨录》真实记录了贾亦斌与蒋经国从好友到决裂的彷徨苦闷，情感冲撞与痛切理智的思考，对蒋介石反共内战政策的厌恶与反击——“觉今是而昨非”的心路历程。贾亦斌自述资料翔实，文风朴素，其中不乏惊心动魄的传奇色彩。书中表现了在旧中国，在特殊的历史环境中，一个正直的中国人爱国、忧国、报国的情愫，这可以昭告后人，启迪来者。

贾亦斌在新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长期参加民革地方和中央的领导及祖国统一工作，为两岸沟通，多方交往，数渡重洋，与蒋经国互为传话致意。为反对“台独”竭尽心力，他主编《论台独》一书，在大陆与台湾出版，这在其自述的下半部将有详细记述。

我愿意郑重向读者推荐贾公的《半生风雨录》。是为序。

自序

写自己的回忆录，是我年届八十请辞民革中央副主席时所作的《八十述怀》诗中提出的诺言。我当时在诗中写道：“人生八十今非稀，盛世躬逢心旷怡。历尽沧桑奉献少，晚来补过志‘三遗’。”所谓“三遗”是：“一遗”为统一祖国，人人有责，我虽年老，仍应“不遗余力”；“二遗”为写回忆录，给我子孙留点“精神遗产”；“三遗”为应珍惜余年，多读点书，以弥补幼年失学的“遗憾”。从这时起，我就有时间静下心来回顾自己的生平，认真总结经验教训，用以律己和教育我的子孙。这段时间反思的结果，就是摆在读者面前的这部《半生风雨录》。

我出生于本世纪初叶——1912年，今年84岁了。我这一生以1949年嘉兴起义为界线，可以鲜明地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在旧中国度过的前半生和在新中国生活的后半生。新、旧时代，变化之大，这是每一个过来人都曾经感受到的，因此将两者分别开来，各自独立成篇，看来是合适的。我的前半生充满了苦风凄雨和暴风骤雨，故名之曰：半生风雨录。这就是此书命名及形成之由。

来。

二十世纪上半叶,对世界和中国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时代。就世界而言,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给各国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灾难。第一次大战,中国派出十几万民工参加,付出了不少牺牲;第二次大战的战火可以说最初是从东方燃起的,我国军民率先奋起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东北、华北,逐步扩展为全面抗战,长达14年之久,死伤军民3500万人以上,其他损失更是难以计算。就国内而言,50年内先后经历了辛亥革命、护国战争、护法战争、北洋军阀混战、北伐战争、新军阀混战、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人员伤亡与财产损失至为巨大。这是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侵略和压迫之下,中华民族最不幸而极悲惨的时代,同时也是我国人民觉醒奋起,救亡图存,推翻三座大山,逐步取得胜利的时代。

我在灾难深重的旧中国前后生活了38年。我的故乡湖北阳新自古以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天灾人祸,连绵不断。所以我在本书中首先记述了自己苦难的童年。我出身寒苦的农民家庭,从小受到家庭和私塾的仁义道德的教育;农忙时帮助父母做些农活。为了逃避军阀混战,我父亲常常夜里背着我“逃反”,至今我记忆犹新。北伐战争时期,我开始受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思想的影响,热烈欢迎北伐军,当了儿童团长,参加农民运动,打倒土豪劣绅和抵制日货。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后,阳

新一带处于白色恐怖之中，父亲被迫带我背井离乡，到黄石港以织布卖鱼谋生，后又送我到武昌上中学。不到一年，父亲因劳累过度，急病身亡。我因学费和生活无着，向亲戚借钱受辱，愤而当兵。18岁那年，我报名参加了当时正在武汉招兵的徐源泉第四十八师教导人。旧军队是用士兵的血泪织成的。我在其中常遭鞭挞辱骂之苦，许多次在被打以后，我含着泪暗自下定决心：将来我当了军官绝不打骂士兵。当时新旧军阀混战，我随着部队也不可避免地被卷入了战争。更不幸的是，我当学兵和任排长时，曾先后两次参加“剿共”战斗。抗战爆发，我自告奋勇，请缨杀敌，参加了淞沪、徐州、武汉、鄂西和长沙等五大战役，两次受伤，不下火线，誓死不当亡国奴，因战功从营长不次提升为师参谋长、军委会少将参议。抗战后期，由彭位仁、韩浚推荐，我考入陆军大学学习。在陆大，我研究“新国防论”和预备干部制度理论，并认识了同学段伯宇（中共地下党员），受到进步思想的影响，逐步走上革命的道路。

抗日战争胜利后，我同全国军民一起欢呼胜利，切盼休养生息，和平建国，但蒋介石在美国的支持下，又悍然发动内战。我坚决反对内战，拒绝接任军参谋长职务赴山东前线作战，后经彭位仁介绍到军事委员会青年军复员管理处工作，与蒋经国不期而遇，成为他的直接部下。由于我们年龄相若，意气相投，很快成为知交好友。我和谭吟瑞结婚时，蒋经国主动为我们证婚和主持婚

礼。他对我信任有加，不次提拔。不到两年，就由组长、办公室主任而升为副局长，最后接替他担任代局长，成为当时被称作“太子军”的青年军领导人之一，负责主持国防部预备干部局的工作。我与蒋经国素昧平生，萍水相逢，而且多次因工作问题与之发生冲突，但他都不以为忤，反而表示欣赏，并力排众议，亲自向蒋介石保荐提升我，使我深感其知遇之恩。我在感激之余，又对他寄以厚望：希望他能有所作为，影响其父亲，肃清国民党内部的腐败势力。

但我越接近国民党政权的核心，就越了解四大家族
的黑暗内幕，也就越感到失望和痛恨。而且看到国民党
发动内战，不得人心，蒋军在战场上节节败退，蒋管区民
众反抗运动风起云涌，国民党政权内外交困，已呈现出
土崩瓦解之势。在这一历史关头，个人何去何从，我的思
想斗争非常激烈。最初我想尽快脱离蒋政权，解甲归田，
退隐山林，但很快发现遍地战火，无处安身，退隐之念纯
属幻想。我面前只有两条路，一是继续追随蒋氏父子，最
后做蒋家王朝的殉葬品，这是死路一条；一是弃旧图新，
反戈一击，投向人民的怀抱。但我与蒋经国关系如此密
切，中共能否相信与宽容？后经党的政策的宣传教育，并
看到许多国民党将领毅然起义或投诚，受到党和人民的
欢迎，这些顾虑就逐渐消除了。但是，蒋经国对我有知遇
之恩，旧时代“士为知己者死”的观念对我影响甚深，如
我此时弃他而去，内则觉得于心不忍，外则怕人说我“忘

恩负义”，骂我“叛逆”。直至1948年秋，我随蒋经国在上海“打老虎”，开始他确实铁面无情，处理了一些违法乱纪的人，但当碰到四大家族中孔祥熙的儿子孔令侃时，他怵于宋美龄和蒋介石的巨大压力，临阵退缩，不敢触动。为此我与他发生了激烈争执，甚至当面向他拍桌子，他则以“尽孝不能尽忠，忠孝不能两全”的托辞来为自己辩护，使我以前对他所抱有的幻想完全破灭了。我也由此进一步认识到，忠于个人是小忠，忠于国家民族才是大忠，两者难以并存之际，只能大义灭亲，而决不可因小弃大，搞无原则的“愚忠”。国民党政权腐朽黑暗，四大家族祸国殃民，已为中国人民所抛弃，对它反戈一击，是顺应历史潮流、为国为民立功的正义之举，而不是什么“叛逆”。因此我断然决定与蒋经国最后决裂，弃暗投明。

我通过段伯宇与上海地下党联系，并在党的领导下，为发动反蒋武装起义积极作准备。我和段仲宇、宋健人、刘农峻、林勉新等陆大同学，曾密谋在南京发动“第二次西安事变”，逮捕蒋介石等国民党要人，将其送往解放区，因条件不成熟被段伯宇劝阻。蒋氏父子对我产生怀疑，特将我召到奉化溪口进行“考察”时，我又曾动念为早日结束内战，欲像荆轲刺秦王那样，用手枪击毙蒋介石，然后自杀，以谢天下，继想到上海地下党领导所说“无产阶级革命不搞暗杀”而中止。1949年4月7日，为策应人民解放军渡江，在中共上海局领导下，我率领预干总队在浙江嘉兴举行武装起义，在沪、宁、杭敌人心脏